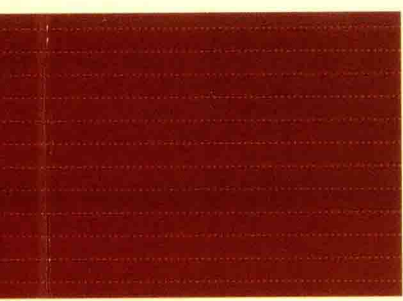




中国思想史研究

· 侯外庐研究专辑

谢阳举 郑 熊 主编 西北大学出版社



谢阳举 郑熊 主编

中国思想史研究

侯外庐研究专辑

中国思想史研究

北京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思想史研究·侯外庐研究专辑 / 谢阳举, 郑熊
主编. —西安: 西北大学出版社, 2017. 2

ISBN 978-7-5604-3971-6

I. ①中… II. ①谢… ②郑… III. ①思想史—中
国—文集 ②侯外庐(1903-1987)—学术思想—研究
IV. ①B2-53 ②K825.8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308371 号

中国思想史研究·侯外庐研究专辑

主 编: 谢阳举 郑 熊

出版发行: 西北大学出版社

地 址: 西安市太白北路 229 号

邮 编: 710069

电 话: 029-88303059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装: 西安华新彩印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16

字 数: 194 千字

版 次: 2017 年 2 月第 1 版 2017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604-3971-6

定 价: 42.00 元

目 录

- 1 | 侯外庐先生中国思想史研究的特色与贡献
张岂之
- 6 | 侯外庐在史学理论与学科建设上的贡献
瞿林东
- 35 | 侯外庐史学的创新精神与侯外庐学派
任大援
- 54 | 略论侯外庐先生在史学理论方面的两个贡献
刘文瑞
- 64 | 侯外庐先生论中国历史的特殊道路
方光华
- 81 | 近代外来学说中国化的两点历史经验
——以侯外庐建立马克思主义中国思想史学科为例
张茂泽
- 100 | 谈谈有关“启蒙”的话题
——以侯外庐先生的启蒙思想研究为中心
张海燕

- 131 | 试论侯外庐先生经学研究的特色及意义
陈战峰
- 149 | 侯外庐先生的教育思想与实践
——以其担任西北大学校长为中心
方光华 曹振明
- 173 | 从社会史与思想史的角度看殷周之际的变迁
夏绍熙
- 193 | 侯外庐对中国封建社会土地所有权的研究
韩永志
- 215 | 略论侯外庐先生的治学特色
杜运辉
- 222 | 外老与《中国史研究》杂志
苏 辉
- 227 | 《侯外庐著作与思想研究》与侯外庐先生的学术思想
袁志伟
- 238 | 侯外庐：新中国史学界一代宗师
——《侯外庐著作与思想研究》编后
张中良
- 246 | 后记

侯外庐先生中国思想史研究的特色与贡献

张岂之

(西北大学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

侯外庐(1903—1987)先生,是我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中国思想史学家、教育家,与郭沫若、范文澜、翦伯赞、吕振羽诸学者并称为史学界“五老”。侯外庐先生将中国思想史置于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基础上,开创了享誉学林的侯外庐学派,对于促进马克思主义史学中国化做出了重要贡献。

长春出版社于2012年提出编辑、出版《侯外庐著作与思想研究》,经过四年努力,这套书共33卷即将面世。我想对此做一些介绍,供读者朋友们参考。

一、侯外庐论中国历史的独特道路

侯外庐先生论中国历史、中国社会史和中国思想史,既继承中国思想学术史的优良传统,又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作为研究指导。这正如历史学家白寿彝先生所说,侯外庐“研究中国历史总是想把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中国化,也可以说把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民族化。这一点很重要”。又说:“这反映了我们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到新的阶段,外庐同志的著作是这个阶段的标志。”

侯外庐先生对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的学习和研究，开始于1928年至1938年这十年间对马克思《资本论》的翻译。他说：“对于一部完整的科学理论，翻译中的理解角度，往往不同于阅读中的理解角度。我在历史研究中所注重的研究方法，相当程度取决于我对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理论的形成和发展过程的认识。”这说明，侯外庐先生用十年时间从事《资本论》的翻译，是为了理解什么才是马克思历史唯物论的真谛。

侯外庐先生曾经说，我们要现成地从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中找到关于中国社会史与思想史的具体结论，那是不可能的。《资本论》的主题并不是中国历史和中国社会，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也没有提到中国。

侯外庐先生认为，马克思在分析以印度为主的东方古代社会时，曾经提出“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概念，不过这个理论并不十分明确和系统，因而国际学术界对此概念的理解也存在很大分歧。在此情况下，侯外庐先生于20世纪30年代，仔细阅读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资本论》和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查找出100多条马克思、恩格斯有关东方古代社会的论述，从而对于“亚细亚生产方式”有了比较全面的理解。1945年侯外庐先生发表《我对“亚细亚生产方法”之答案与世界历史学家商榷》，1946年他又在修改《中国古典社会史论》（1941年出版）的基础上，出版《中国古代社会史》（1955年再版时定名为《中国古代社会史论》），对“亚细亚生产方式”做了全面的论述。

侯外庐先生的这些论述，其主旨在于说明中国古代与西方古代不同，有自己独特发展的道路，认为，世界上古代文明的发展路径不止一条，有古典的形态（如希腊），还有非古典的

形态，即“亚细亚生产方式”，这在中国的古代表现为：从氏族社会走向文明社会，保留了旧有氏族组织的某些方面，在氏族血缘关系的基础上建立起国家组织；由此演变成为血缘的宗法制。侯外庐先生强调，中国学人研究中国历史和文化，要找出自身的特点，不可用西方历史的模式来硬套中国历史。

在20世纪40年代，当侯外庐的《中国古代思想学说史》再版之际，他写下这样的感言：“中国学人已经超出了仅仅仿效西欧的语言之阶段了，他们在自己的土地上无所顾虑地能够自己使用新的方法，发掘自己民族的文化传统了。”在20世纪，经过长期探索，中国史学家不必言必称希腊，他们努力将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与中国历史文化相结合，进行创造性研究，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

二、《中国思想通史》的学术价值

侯外庐先生主编的《中国思想通史》（共五卷六册，260余万字），是一部完整的关于中国思想史的学术著作。

中国思想史是中国历史的一个组成部分，是理论化的中国社会思想意识的发展史。中国历史上的政治思想、经济思想、哲学思想、科学思想、法律思想、军事思想等，都是中国思想史的研究对象。在中国思想史的综合研究中，更多是关于哲学思想、道德伦理思想、政治思想的内容。

侯外庐先生主编的《中国思想通史》第一卷（先秦时期）撰著于1946年，1947年出版，作者署名是侯外庐、杜国庠、赵纪彬。《中国思想通史》第二卷（秦汉时期）与第三卷（魏晋南北朝时期）完成于上海解放前夕，作者除以上三位，增加

了邱汉生先生，1950年出版。新中国成立后，侯外庐先生指导他的几位助手，于1957年完成《中国思想通史》第一、二、三卷的修订增补工作。第四卷（隋唐宋元明时期）是在不适合进行学术研究的1957年至1959年完成的，作者队伍有所扩大，于1960年出版，分上下两册。侯外庐先生回忆说：《中国思想通史》第四卷“留下了粗糙的痕迹”。《中国思想通史》第五卷定名为《中国早期启蒙思想史》，1956年出版，内容从明末清初开始，由《近代中国思想学说史》（1945年出版）补充、修订而成。

综观《中国思想通史》五卷六册，从写作、出版、修订到再版，历时较长，其时正是社会激变时期，侯外庐先生等老一辈学者生活在动荡中，承受着不少压力，但他们仍然坚持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作为指导，完成了卷帙浩繁的学术著作，其动力来源于内心深处的强烈责任感。《中国思想通史》最显著的特点是：将中国思想史建立在中国社会史的基础上，这样，思想就有了社会基础。

《中国思想通史》除力图展示历史与逻辑的统一，还注意关于社会思潮与思想史学派的研究。它告诉人们：中国思想史不仅有代表性的思想家的思想研究，而且有基于社会存在而形成的某一历史阶段中饱含时代特色的思想史，对今天和未来都具有重要的影响力。也就是说，思想家与时代性结合在一起。

关于中国社会史与思想史的联系，侯外庐先生有两本著作，即《中国古代社会史论》与《中国封建社会史论》可作代表。侯外庐先生关于中国封建社会的论述，曾提出“土地国有论”观点，这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曾经引起学术界的讨论。什么是“土地国有论”呢？他说：“我所讲的‘国有’即马克思所

指的‘国家’或‘君主是主要的土地所有者’，这是中国封建社会中长期占支配地位的土地所有制形式，但它不是唯一形式。”不同历史时期的“皇权”就建立在这个物质基础上。

我还想提到，《中国思想通史》继承了中国传统的考据方法，这不是偶然的。侯外庐先生对王国维史学方法有过精深的研究；杜国庠先生对儒墨思想做过深入的比较研究；赵纪彬先生对章太炎的学术研究方法有系统的论述；邱汉生先生精于古史考证，并长于义理发挥。他们的这些优长结合起来，就形成了《中国思想通史》中对传统研究方法的传承与发展。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可以和传统的学术研究方法结合，并赋予它新的生命力。

侯外庐先生的中国思想史研究，发掘了不少过去不被人们注意的思想家，比如对清初方以智的全面论述，就是显例。他还重视中国思想史的普及工作，与其助手写了教材性质的书，如《中国思想史纲》《中国哲学史略》等。

侯外庐先生的自传《韧的追求》一书是以自评《中国思想通史》作为结束语的，他说：“我的工作只是对中国思想史作了初步探索，中国丰富的珍贵的思想遗产有待进一步整理与总结。‘青，取之于蓝而胜于蓝；冰，水为之而寒于水’。先哲荀子的名言说出了后来居上这个真理。我深深期望也深深相信，我国的思想史、哲学史的著作之林将来会出现凌云的杰构。”

原发表于《光明日报》，2016年1月6日

侯外庐在史学理论与学科建设上的贡献

瞿林东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

《侯外庐著作与思想研究》三十三卷巨帙的出版，进一步展现出了侯外庐先生学术思想的博大精深。这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史上的一座丰碑，是中国近现代学术史上的宝贵遗产，它在当今和未来的中国学术事业发展中，必将产生更广泛的积极影响。

张岂之先生在这一巨帙的《总序》中指出：“侯外庐先生治中国历史、中国社会史和中国思想史，既继承中国思想学术史的优良传统，又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作为研究的指导，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社会史、学术史、思想史研究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①《总序》还对侯外庐先生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学术观点与理论阐发，以及《中国思想通史》等著作，做了中肯、简明扼要的评价，对读者了解、阅读这部巨帙，具有指导意义。

本文仅就侯外庐先生在史学理论与历史学学科建设上的贡献，如论史学工作者自身的修养、历史研究的原则和方法、历

^① 张岂之：《侯外庐著作与思想研究·总序》，见《侯外庐著作与思想研究（第一卷）》，长春出版社，2016年版，第1-2页。

史研究新的生长点如何产生、人才培养与教学改革，以及马克思主义史学中国化等重要问题，讲一点我学习的体会和粗浅的认识，向史学界同仁请教。

一、论史学工作者的修养

关于史学工作者的自身修养，是侯外庐先生在史学领域中最关注的问题。他在1961年发表的《在严格要求下从事科学研究工作》、1979年发表的《实事求是，搞好史学研究工作》与《提倡科学上的诚实态度》，以及1986年修改定稿的《侯外庐史学论文选集·自序》等文，都对此有所论述，他的基本观点是：

对待科学工作应该有严肃认真的态度、实事求是的科学方法。这就是说，研究任何问题都必须从实际出发，详细地占有材料，从这些材料中找出事物固有的内部联系，引出正确的结论。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作家无论是研究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探索历史的总的发展进程，或是研究某一个专门领域以至个别的历史实例，都严格遵循这种科学的方法。^①

这里说的“严肃认真的态度，实事求是的科学方法”，是侯外庐先生关于科学工作者（包括史学工作者）自身修养的总

^① 侯外庐：《在严格要求下从事科学研究工作》，见张岂之：《侯外庐著作与思想研究（第二十四卷）》，长春出版社，2016年版，第831页。

的认识。这一认识，是从马克思、恩格斯和毛泽东的有关论断中和他本人的学术生涯中概括出来的。

在此后的十余年中，尤其是经历了“文化大革命”后，侯外庐先生对史学工作者自身的修养，提出了更加明确的认识。首先，他强调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性和迫切性。1979年，他在《实事求是，搞好史学研究工作》一文中指出：

建国以来，我们史学工作者做了不少的工作，其中有许多成功的经验，也有一些失败的教训。所有这都需要我们深入地加以总结，作为我们进一步开展史学研究工作的借鉴。我们把经验总结起来，才能够彻底肃清“四人帮”的余毒。这两个方面是相互联系的。

我们的经验很多，集中到一点上，就是要加强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学习，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①

这是一位老一辈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在经历了数十年的风风雨雨之后所总结出来的基本经验。他说的学习马克思主义和“彻底肃清‘四人帮’的余毒”，“这两个方面是相互联系的”，道出了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思想界、理论界、学术界所面临的最紧要的任务。人们在痛定思痛之后，对于侯外庐先生所总结的经验教训，必然有强烈的共鸣，这就是：

^① 侯外庐：《实事求是，搞好史学研究工作》，见张岂之：《侯外庐著作与思想研究（第二十四卷）》，长春出版社，2016年版，第855-856页。

我们讲要坚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对于史学研究的指导，就是要从马克思主义那里找研究历史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绝不是要我们把马克思主义的个别词句当成抽象的公式和套语，去任意剪裁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也不是要我们用马克思主义的个别词句去代替对于历史实际的具体研究。恩格斯说：“我们的历史观首先是进行研究工作的指南，并不是按照黑格尔学派的方式构造体系的方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56页）^①

侯外庐先生明确指出，对于背离、破坏马克思主义的做法，必须坚决反对，予以揭露。然而，把马克思主义作教条主义的理解和做法，也必须予以纠正。这是从正反两个方面总结出来的理性认识。这一认识，对于正确评价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历史，辨明其现实的道路和未来的前景，都是十分重要的。侯外庐先生的这一认识，在今天的史学界以至学术界，仍具有突出的现实意义。

其次，他强调史学工作者应具有科学上的诚实态度。侯外庐先生在1979年撰文指出：“我们应当提倡科学上的诚实态度，反对科学上的卑鄙行为。我的这个意思并不是什么新东西，而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早已经讲过多次的。”他进而对这句话做了如下解释：

^① 侯外庐：《实事求是，搞好史学研究》，见张岂之：《侯外庐著作与思想研究（第二十四卷）》，长春出版社，2016年版，第856页。

什么是“科学上的诚实”？那就是“毫无顾忌地”尊重客观规律的科学精神。马克思在《剩余价值理论》（《资本论》第4卷）中称赞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家李嘉图的这种态度。他说：“李嘉图的毫无顾忌不仅是科学上的诚实，而且从他的立场来说也是科学上的必要。因此对李嘉图来说，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究竟是毁灭土地所有权还是毁灭工人，这是无关紧要的。如果这种进步使工业资产阶级的资本贬值，李嘉图也是欢迎的。如果劳动力的发展，使现有的固定资本贬值一半，那将怎样呢？李嘉图说：‘要知道人类劳动生产率却因此提高了一倍。’这就是科学上的诚实。”（《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2册，第125页）^①

侯外庐先生认为，作为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在“人类劳动生产率”提高的面前，即使会导致“资本贬值”的结果，李嘉图在理论上说了真话，因此受到马克思的称赞。这就是“科学上的诚实态度”。当然，后来资产阶级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还是丧失了这种“科学上的诚实态度”。可见，坚守这种“科学上的诚实态度”，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侯外庐先生认为：同“科学上的诚实态度”相对应的，是“科学上的卑鄙”。他援引马克思的话做解释，写道：

什么是“科学上的卑鄙”？用马克思的话说，就

^① 侯外庐：《提倡科学上的诚实态度》，见张岂之：《侯外庐著作与思想研究（第二十四卷）》，长春出版社，2016年版，第858页。

是：“一个人如果力求使科学去适应不是从科学本身（不管这种科学如何错误），而是从外部引出的、与科学无关的、由外在利益支配的观点，我就说这种人‘卑鄙’。”马克思把李嘉图和马尔萨斯做对比，尖锐地批评马尔萨斯是个“无赖”“无耻的献媚者”，他为了资产阶级的特殊利益而在科学领域内伪造自己的结论，“这就是他在科学上的卑鄙”。（上引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2册，第126-127页）^①

在经历了“文化大革命”之后，尤其是目睹了“四人帮”对科学的践踏以后，侯外庐先生对马克思的上述见解有着更加深刻的认识，这就是：终生为追求科学而奋斗，为无产阶级最高利益而奋斗的马克思，在“科学”面前不容有半点虚伪，“诚实”的对应面便是“卑鄙”。唯其如此，提倡“科学上诚实态度”是多么重要。

再次，他强调史学工作者应具有自省的精神品质。侯外庐先生晚年写过这样一段话：

执行自我批判，聆听学术批评。我认为，学贵自得，亦贵自省，二者相因，不可或缺。前者表现科学探索精神，后者表现自我批判勇气。历史科学如同其它科学一样，总是在探索中前进的，难免走弯路，有反复，因而不断执行自我批判，检点得失，总结经验教训，是十分必要的。否则就会固步自封。就资质而

^① 侯外庐：《提倡科学上的诚实态度》，见张岂之：《侯外庐著作与思想研究（第二十四卷）》，长春出版社，2016年版，第859页。

论，我是个常人，在科学道路上自知无捷径可走，惟砥砺自学，虚心求教，深自省察，方能不断前进。我和我的合作者可以互相改稿，没有顾虑。即或是青年同志，只要他们对我的稿子提出了意见，我总是虚心考虑，将不妥之处反复进行修改。仅以《老子》研究而言，我自30年代撰写《中国古代社会与老子》至50年代修订重版《中国思想通史》第一卷的20年间，曾四易其稿。每易一稿，都可以说是执行一次自我批判。^①

读着这段话，我总是会联想到郭沫若的“自我批判”，联想到范文澜为他撰写的《中国通史简编》所作的长篇“检讨”文字，这难道不正是老一辈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共同品质吗！虚怀若谷，在反思和自省中不断进取，这是多么纯朴的学风和高尚的精神！这种品质、学风、精神，是史学工作者自身修养的崇高境界，永远值得后人敬仰、学习。

上述三个方面综合起来，是强调史学工作者在理论上和品质上修养的重要性，即正确的理论指导，“科学上的诚实态度”和“执行自我批判”的精神，是史学工作者在其学术生涯中要思考、要坚守的几个重要方面。

二、论历史研究的原则和方法

历史研究的基本路径、原则和方法，是侯外庐先生关注的

^① 侯外庐：《侯外庐史学论文选集（上）·自序》，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9页。